

重访老舍在“齐大”的旧居

胡絮青

齐鲁大学办公楼二楼

1930年春天，老舍从新加坡归国，住在上海郑振铎先生家里写完《小坡的生日》之后，回到了他的故乡北京。在北京，他只住了三四个月，就应齐鲁大学文学院的聘请，在暑假结束前到了济南。那时他单身一人，住在齐鲁大学办公楼二楼的一个房间内。

楼在“校友门”（即现在山东医科大学的牌楼式校门）内的东边，坐北面南，是一座青灰色砖石结构的建筑物。包括地下室共为三层，老舍住在地面上二楼西头南边的第一间，实为全楼的西南角。从这间屋子里推窗南望，可以远眺庙宇点点的千佛山；楼下，槐榆夹道，碧草如茵，不远



原“齐大”办公楼现山东医科大学办公楼

处还有一个圆形喷水池。齐大的校园内很是幽雅。可是，校门外，却另是一番景象。每当老舍走出校门，看见济南老城西门和南门上的炮眼，他就想到两年前发生在济南的“五三惨案”。他开始收集有关这件事的材料。1931年的暑假以前，老舍在这间屋子里写出了以济南惨案为背景的长篇小说《大明湖》。可惜，小说原稿寄给上海《小说月报》之后，在1932年的“一二八”沪战中，葬身火海了。这是他丢失了的第一部小说原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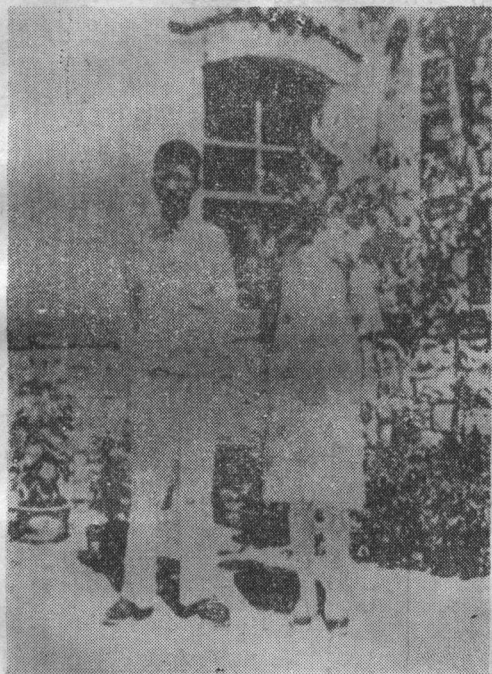
读过《大明湖》原稿的，据我所知，只有两人，一位是徐调孚先生，听说已作古了；另一位就是老舍当年的好友兼邻居张西山先生。张先生如今年已八旬，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。他对我谈起不少当年他和老舍对门而居的过从情况。他们两人都是穷苦出身，很谈得来，常在一起散步聊天儿。有时候还就着花生米干几杯。张先生记得很清楚，老舍在这间屋子里住了整一年，备课，写作，还兼着《齐大月刊》的编辑。

济南南新街54号

1931年暑假，老舍回北京和我结婚。婚后，我们一起回到济南，在南新街租了一所小屋子，当时的门牌是54号。在这里

我们住了三年，生下了舒济。

南新街就在齐鲁大学的北边，是一条有个折弯的南北胡同。我们住的小院子，大门坐东向西；二门内的西、北、东三面有房：紧靠大门洞的门房由老田夫妇住着，西屋两间是大家吃饭的地方，东屋是厨房，厕所在东南的角落里，我和老舍住北房。北房说是三间，实为三间半，西山



1931年老舍夫妇在南新街54号寓所

墙后边还连着一个暗间，堆放杂物。北房的东边一间半加了隔断，作为卧室；西边一间半，是老舍会客和写作的地方。他的长篇小说《猫城记》、《离婚》、《牛天赐传》，《赶集》中的绝大部分短篇小说，如《大悲寺外》、《马裤先生》、《微神》、《开市大吉》、《歪毛儿》、《柳家大院》、《抱孙》、《黑白李》、《眼镜》、《铁牛和病鸭》、《也是三角》等，还有发表在《论语》等刊物上的幽默诗文，大都写成于这间屋子。当时，他的书桌就在西间的南窗下。

院子不很大，当时种满了花草，盆养的畦栽的都有，还有一棵不算小的紫丁香和一大缸荷花。院子里有一眼水井，一早一晚，老舍自己打水浇花，施肥，捉虫，所以花儿开得很旺盛。每年开春以后，小院里花香不断，五彩缤纷，吸引着不少朋友来我们家赏花。老舍一生爱交朋友，只要有人来访，他都热情款待，客人走后他才拚了命似地作他自己的事情。记得，1932年的夏天，济南出了奇的酷热，一过上午九、十点钟，热得人喘气都感到困难。据说，那年济南热死了不少卖力气的苦人。就在那样的盛暑中，就在这个闷热难当的小院里，老舍一天也没敢歇着。他抢在太阳出来之前起床动手写作，头上缠着湿毛巾，肘腕子下面垫着吸墨纸，以防汗水湿透稿子。就这样，每天至少赶出两千字来。一个暑假，他“拚”出了一部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《离婚》。如今，我一走进这个院子，看见了北房，立刻想起了他写作时的万般辛苦！

这所房子，现在是南新街58号，院内的格局没有什么大变化，只是二门拆除了，北房也在原房基上翻盖过，茅草顶换成了红瓦房。丁香树也许死于战乱了，那口水井还在。让我们大家都感到有趣的是，现在的北房主人徐同志也很喜欢养花，门前垒起一座花台，大盆小盆里长着各色的月季，茉莉的叶子油绿油绿的，春色可人，颇似当年老舍在这里经营花木小院的韵味。

离开这个小院，我们在周围漫游了一阵子。往北，走不多远就是名闻全国的趵突泉；往南，不到十分钟的路程，就到了齐大。当初老舍所以选定这个地方，就是因为它离学校近，他去上课和学生有事来找他，都方便得多。

齐鲁大学内长柏路2号

我们刚回济南的时候，暂时住在齐大校园内的“老东村”平房内。不到一个月，又搬进了齐大校园内的长柏路2号。这座灰色砖楼的结构颇为别致：由当中并列的两个楼门和平行上升的两个楼梯，把小楼一分为二，东西各半。我们住的是东半楼。楼下的两大开间作为客厅和书房，楼上三间作为卧室。厨房在楼下。这一带有好几座式样不同的小楼，住的多是外籍教授，环境很美。楼前楼后有不少苍翠的松柏。站在我们的卧室里，又可以在晴空下远眺千佛山和马鞍山的秀色了。只是，这时已国难当头，兵荒马乱，谁还有心思去观景！



老舍旧居现山东医科大学内长柏路2号

老舍在长柏路2号只住了两个来月。那时候，虽说学校已经开学，实际上已无法上课。每天都有教师和学生来和老舍辞行，有往南边走，有的回家乡。老舍在

这座小楼里忧心如焚，编写讲义和创作作品这两件事尽管没有完全停下，但他最关心的事情已是看报纸和听广播了。我知道他已下定奔赴国难的决心了，只是还记挂着我们娘儿四个，不知该怎么安排才好。我催着他快走，告诉他，以后由我来奉养他的老母和抚育这三个孩子，让他一心抗战，勿作后顾之忧。他老是说“再看看再看看”，总盼着“国军”能在华北多打胜仗。到了11月15日的傍晚，离济南不远的黄河铁桥炸毁了，日本军队已逼近济南，形势十分急迫。沉思中的老舍猛地站起，和我说了几句话，挨个看看极幼小的孩子们，提起早就收拾好的那个行李箱子，一步一步地下楼奔火车站去了。

从走出这座灰楼开始，老舍踏上了八年如一日的“八方风雨”征程，在整个八年抗战期间，他在大后方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，为祖国的抗战献出了一个文化人的全部力量。从走出这座灰楼开始，老舍再也不能重回济南……

老舍走后，我们在济南熬到了1938年秋天。津浦路通车了，我和孩子们回到了北京。那时候，日本军队在火车上盘查的十分严苛，我们只能携带最简单的随身物品。老舍的全部书籍、讲义文稿，装在一个大木箱内，留在长柏路2号的楼上，我一再拜托学校帮忙照看。后来我托人去济南查问，据说已不知下落。那是老舍十几年的心血，但愿它们不至于全部毁于战火！

（节选自胡絮青《重访老舍在山东的旧居》本文题目作者加以改动）